



马林诺夫斯基的辩证法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1-0181-08

● 马丹丹

[摘要] 人类学到底属于“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人们对此分歧很大。马林诺夫斯基在民族志和日记两种体裁中表现出来的表述分裂影响到列维-斯特劳斯和格尔茨，同时，他对美拉尼西亚岛民的性自由的保守看法也影响到玛格丽特·米德的“亲善寓言”。正是这位人类学大师造成了人类学现代学科权威形成伊始的矛盾处境，他的中产阶级心性也正在得到进一步的解读。

[关键词] 科学；人文；文化迫力；中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与《严肃日记》是马林诺夫斯基在特洛布里恩德岛上四年田野调查的同时产物，两者的戏剧性反差成为人类学界的一大新闻事件，并且很大程度上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民族志的反思思潮中被关注。尽管不断有学者批评马林诺夫斯基的“伪科学”，但是放到今天的学术背景下来看，《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科学雄心依然意义深远。本文近似于对马林诺夫斯基精神分裂人格的分析，希冀通过他的日记，建立其内心世界与文化理论的联系，发现马林诺夫斯基文本“泄露”的科学与人文的矛盾等诸多矛盾的线索。

一、审慎的信仰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①卷帙浩繁，繁之又繁的库拉圈的描述整洁而诚实，规范和细腻。可以说，我还是被马林诺夫斯基的“科学”征服了，忘掉了塑造文化完整性的技术，忘掉了民族志与日记的分裂。马林诺夫斯基残留了

①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早期殖民者的冒险精神,以“直接观察土著”的方法论的革命征服了古典人类学,无论他承受后人多少嘲笑和背叛,这种精神还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以《航海者》开头,引出民族志写作的话题。

阅读了康拉德的航海小说,如《黑暗的心》,的确发现了克里福德所对比的二者在风格(*self fashion*)上的差异。康拉德承受着殖民的道德谴责和反讽,马林诺夫斯基则雄心勃勃,一心要靠伟大的民族志作品进军英国的学术界。^①这样,在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其作品规整得惊人,而另一方面他要因野心而失却康拉德式的“审慎的信仰”。关于我们对于民族志的信仰,既是一种“大行大愿”,又是一种生命的挫折和痛苦。简言之,它为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遭遇(*encounter*)?民族志者求索的知识是经过身体力行获得的,然而知识的客观性又往往必须和身体力行剥离。大多数情况是,文本呈现出的是知识的系统有序、精心布局,身体只是一个载体,在“遭遇”和“缘分”后,身体就隐退到幕后,知识没有经过挣扎,就流畅地绵延——那一种深刻的情感之旅被筛选掉。从把握科学与人文的平衡视野来看,马林诺夫斯基的困境似乎比后人要好一些。

马林诺夫斯基在《航海者》中不仅开出严谨的科学方法论单子,而且也贯彻始终,实践他心目中的“伟大的科学”。有意味的是,人的情感,被小心翼翼地控制住了。他多次强调,反复观察,直到得到正确的规律。他用了重组的方法,认为这并不伤害土著原意,且保证了社会组织的系统性。最后,他直接提出,可以无需土著的介入,借助研究者的逻辑,就可以构建库拉圈的社会体系或社会理论。问题不在于人类学是科学还是人文的归属,问题在于马林诺夫斯基自身的科学与人文的矛盾如何以其他方式表述。

可见,精神分裂不是马林诺夫斯基一个人的精神症状,而是民族志写作普遍的困境,现代人类学者较之想象异邦的艺术家或其他摇椅上的民族学家而言,集中承载了现代主义的命题,只不过大师的痛苦更加有戏剧性罢了。^②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来看,如果对于当初的马林诺夫斯基而言现代主义是其奋斗的动力,特洛布里恩德岛四年的田野作业的主题不得不是生物性、本能和文化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文化战胜了生物性,又保持了本能的趋向),功能主义革命使现代人类学开始声名鹊起,那么对于国内上世纪80年代旅游、市场经济催生的人类学等相关学科而言,对于置身田野的人类学者而言,其面对的是日益严峻的职业伦理的挑战。^③

二、马林诺夫斯基的中产阶级批判意识

马林诺夫斯基出身于东欧中产阶级家庭,对于阶级社会有所体验。他自述道:我对于东欧农夫的生活、风俗、心理等亲历的知识,使我认识到,同一社会里不识字的阶级和有教育的阶级在父母对于子女和子女对于父母的心理态度上,并不相同。^④阶级分化的社会体验帮助他建立了人类学与民俗学相互汲取的文化资源。经常被人容易忽视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并未走向阶级斗争的激进趋向,他是一位娴熟的阶级调和的烹饪大师,阶级调和论在《蛮族社会的犯罪与风俗》中尤其明显,此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在《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之比较》当中流露的中产阶级整体批

^① James Clifford. "On Ethnographic Self—Fashioning: Conrad and Malinowski." I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92~113.

^② 阅读马林诺夫斯基所著的《严肃日记》(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笔者发现,日记中充斥了对“堕落感”的恐惧、厌恶。为了克制自己不读小说,不产生色情欲望,马林诺夫斯基甚至以一种强迫症的方式禁止自己“堕落”,日记充满了他作为文明人在蛮荒之岛的自我意识、自我反思以及自我控制。Bronislaw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1967 edition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③ 具体的困境表现参考马丹丹:《审慎的信仰——读〈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2-22.

^④ 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之比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9.

判倾向令人瞠目结舌,其批判建立在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下层阶级与美拉尼西亚野蛮人比较的基础上,其批判的靶子主要是中产阶级围绕两性关系建构的育儿、性教育、性压抑等文明、礼俗。相较于中产阶级的清规戒律,下层阶级的风俗反倒是比较接近野蛮人的风俗,马林诺夫斯基最为崇尚美拉尼西亚的野蛮人保留的自由自在的性天性。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了中产阶级社会“反生物”的变态或病态,如育儿室、母亲与婴儿的分离、性压抑等等伴随一个人从儿童到成年的各个阶段。马林诺夫斯基在阶级分析法中引入了原始社会的参照系,对美拉尼西亚无保留地赞美,使得美拉尼西亚社会俨然是文明之外的“乌托邦”。民族志者想用“野蛮人的性生活”冲击中产阶级既定的、刻板的、权威的文明秩序,建立文明的意识形态批判。因此,原始社会的“倒退”解放了文明对性的压抑。

在此基调上,伴随马林诺夫斯基的却是置身美拉尼西亚田野时无时无刻不在与野蛮斗争的文明人的理性痛苦。这一内心状况却是在《两性社会学》等民族志中看不到的,“隐匿的我”只有在《严肃日记》中才现身。这使我们看到了马林诺夫斯基自身的矛盾,作为科学工作者,他愿意“离我远去”,投身于人类学事业,作为文明人,他要时时刻刻与生物本能斗争,与“腐朽感”斗争,以防落到野蛮人的境地。他的着装、他服用的药剂、他的身体疼痛、他的思乡病等等外化的表现,都构成了他与当地人严格区隔开来的“防御装置”。他会在心里骂他的殖民地英国同胞,牢骚满腹,抱怨重重。他最大的敌人是情欲,所以,他发疯地在日记里写着未婚妻的名字,对她有负罪感,为她有免疫力。马林诺夫斯基集中了殖民地时期现代人类学者置身“蛮族社会”时刻板、拘谨、一丝不苟的自律精神。一方面,他以摧毁乌托邦浪漫主义“善言”的科学主义的田野实证进军英国学术界,通过融入他者的世界,以更为强烈的自反性气质给自己融入了中产阶级的精英意识(这又是马林诺夫斯基令人惊艳的地方),成为上升中的精英,有可能替代或将要替代中产阶级日渐腐化的精英;另一方面,他又是文明与野蛮两极化的“始作俑者”,在他的“防御装置”内外,文明与野蛮的边界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他比他的在殖民地已腐化的英国同胞更加捍卫文明理性的底线,更加保守。通过后一方面,我们能看到,他竟然将田野调查作为对自己的意志力的考验和锻炼,他与他在书中赞美的土著的“生物性”、“本能”、“性自由”对峙、斗争,占领文化的高地。他坚持散步,坚持写日记,坚持田野调查,按部就班地工作,只有置身于“库拉”航海旅行、置身于旖旎风光中,他才彻底从理性的自律中解脱出来,迸发出激情和由衷的欢喜。这个时候,马林诺夫斯基是文学家,是写风景变幻的高手,《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夹杂着“诗一般的语言。”马林诺夫斯基是成功地驾驭“乌托邦”这一指涉性工具的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精英,他为中产阶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一新鲜的血液即来自原始社会的“反文明”的价值世界。当结构—功能主义的全盛时代到来时,不可否认,现代主义的秩序已经被毫不犹豫地确立起来,因为这一“创造性破坏”,包含旧精英的衰落、新精英的上升。

对于一战前后刚刚从非西方田野抽身,匆匆赶来颠覆进化论的人类学者,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而言,文明与野蛮的对接犹如飓风,掀起了中产阶级内部的文化革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革命性颠覆尚被功能—结构的限制所约束。到了60年代,文化的反叛才彻底被吸纳进来,一时间,原始艺术、文化批评(米德式的文化批评实际上沿袭了马林诺夫斯基在《两性社会学》当中的阶级分析法)在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思潮中迅速渗透。只有在这一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与野蛮的意识形态指涉的背景上,在西方中产阶级精英内部接替、循环的自我重新定位的视角下,我们才意识到,缺少了人类学所主导的非西方世界,中产阶级的文明是不完整的。人类学犹如文明的捣蛋鬼,引入自我的他性,曾经引起西方文明的危机意识,但是在60年代,通过反文化的融合,中产阶级在文化领导权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性的自信。或许正是经过了这一挫折后的应对危机,60年代之后的中产阶级才能在政治冷漠、消费前卫的巩固的阶级特征中通过“波西米亚”风情充分地享受“原始社会”。人类学愈来愈“像”纯粹的专业,较之马林诺夫斯基极力从传教士等业余爱好者中确立的职业规范,可以说60年代之后的人类学在专业性、职业性等学术规范方面走向成熟,有了长足的发展。

三、马林诺夫斯基的“黑暗的心”

马林诺夫斯基复杂的性格使他成为谜一般的人物,同时具有无穷的人格魅力。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整理工

作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不过,大师的精神分裂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本文抛砖引玉,希冀从民族志和日记的文体差异上揭示民族志与文化理论的深层困境。

(一)两极化的影响

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马林诺夫斯基也不例外。笔者尝试用自己的话描述马林诺夫斯基的悖论,这一悖论反倒使其文化理论有了鲜明的主张。因此,在这里,笔者不打算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术思想进行分门别类的“科学”的解析,而是从马氏文本内在的紧张开始,描述20世纪20年代一位置身于土著人中的现代人类学家的形象。事实表明,科学主义的范式并非那么轻而易举地被接受,或者说,事实并非像功能主义的出炉那么简单,方法论的革命——直接观察土著,带来的是马林诺夫斯基的“人格分裂”。因此,笔者尝试从马林诺夫斯基人性的薄弱之处窥见其文本紧张感的迫力来自哪里。它能否以此作为突破口,发现功能主义不为人知的一面?

换句话说,马林诺夫斯基体现的现代主义的矛盾在现代主义开始建立的时候就已确定了人类学田野作业范式的宿命,这是马林诺夫斯基留下的巨大的遗产。在他之后,列维-斯特劳斯因为体察到这一宿命的负担,干脆砍掉了“我在”,代之以结构主义的哲学思辨。说到哲学,恰恰是马林诺夫斯基反抗的对象,他将人类学从哲学(实际上是玄学)的统治中拉出来,拉回到现实人生中,拉回到正在进行的社会生活中。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心智”,可看作在结构主义统治的时代对正在消逝的“前逻辑思维”进行了出色的驾驭。这一努力放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多少又是可理解的。与之对照,走向另一极端的是格尔茨,他为了实践马林诺夫斯基的“钻到土著人的脑子里”的理想,将“理解的理解”放大到最大限度,人类学转向了文学批评、文本批评所属的阐释学传统。格尔茨的文本,有如王权、等级折射的隐喻体系。因此,马林诺夫斯基并非仅有“功能主义”而已,从他的两极化影响亦可看出他的价值所在。换言之,面对人类学后期没有结果的争论,马林诺夫斯基无论如何都是绕不开的“原点”人物。

从马林诺夫斯基到米德,亦是经过了艰苦的蜕变。这主要指的是哪一方面呢?需要指出的是,米德在二战后19世纪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崩溃的时代中,以萨摩亚的性自由倡导了性解放的潮流,这和马林诺夫斯基大相径庭,后者未脱威斯马克影响的婚姻家庭论的理论框架,不过有部分的修正,如相较于单婚制,他仍旧认同多妻制的好处,认为多妻制是富裕的象征。我们强化马林诺夫斯基保守的中产阶级心性,会忽略他的反思和批评的气氛。关键是他,在《两性社会学》中奠定了这样的基调,就连美拉尼西亚自由的性交往社会,社会规定也是如此严厉并被执行,例如,私生子不可能与正出的孩子受到同等待遇,未婚先孕是被禁止的,女方在当地名声不好,也会受到羞辱。换言之,用来防止乱伦等性危险的社会制裁非常发达,这一定论较为符合马林诺夫斯基的中产阶级保守的心性,对秩序的强调,对家庭的强调。你会看到,他支持韦斯特马克等人的学说,无疑,这对稳定社会人心也是有影响力的。在《野蛮人的性生活》的民族志中,“自由的性生活”图景按照青春期性自由——结婚——离婚——恢复婚前性自由这一周期安排,同时,社区还有专为性放纵而设的风俗。准确说,性自由、性放纵置于禁止通奸和乱伦的严格的婚姻关系前后,目的是让人们结婚,组建家庭,繁育后代。当性爱通过婚姻的缔结合法化之后,又会被相互照顾、相互爱慕等夫妻之间的义务、责任所替代。实际上,骂人话中“操你老婆”、“和妻子睡觉”成为最狼狽、最恶毒的辱骂。从《野蛮人的性生活》的镜像中,我们看到了日后米德和弗里德曼的公案,双方各执一端,米德着眼于性自由,而弗里德曼着眼于严酷的性禁忌与制裁。双方两极化的对峙,奇异地消融于马林诺夫斯基的相关民族志及其婚姻、亲属、情欲理论中。从马林诺夫斯基到米德,可以简单地看出弗洛伊德对西方社会影响的变迁,或者说中产阶级接受弗洛伊德的方式的改变。米德拿掉了马林诺夫斯基无论是外化还是内化的“防御装置”,大力宣扬亲善寓言。这也是我们重复指出马林诺夫斯基是不得不重温的“原点”人物的原因之一。

从马林诺夫斯基对后人的以上两点影响中,我们发现,两极化几乎是马林诺夫斯基文本的内在紧张,也几乎是他的“人格分裂”的精神症状。笔者愿意接着这一话题,展开对马林诺夫斯基之谜的心理解析工作。

(二)文化迫力与防御

拿出两张照片,照片上的马林诺夫斯基头戴太阳帽,身穿束身衣,靴子紧紧裹着小腿。这副装扮很像是早期印度殖民地的英国人的装扮:从头武装到脚,充分发挥服装的防御性功能,将自身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开来,除了可以预防疟疾等当地传染病的影响,还有不受到当地未开化文明的污染的考虑,是一种保存欧洲文明优越感的

防御性装扮。服装包括面纱、礼帽、紧身衣、绑腿等等经过了医学论证的复杂的防御装备。马林诺夫斯基强大的防御系统并非外在的服装就能支持的，不过我们还是要从服装的防御性开始说起，而且既然说起服装的防御性，就要从《严肃日记》探究他的内心。

对照日记披露的细节，笔者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在日常生活中的“强迫症”。他经常有下意识的举动，强迫自己不读“乱七八糟”的小说，打发田野无聊的时间，强迫自己健身，坚持散步，锻炼身体，强迫自己克服情欲，情欲造成的深深的负罪感、不洁感在折磨着他。当他不能抵抗看小说的诱惑、情欲的诱惑后，他又会懊悔不已，一种强烈的“腐朽感”(rotted)占据着他的内心。“腐朽感”是《严肃日记》当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用词，时不时就会蹦出来，用来衡量作者的道德标准、心情指数。腐朽感消失时，作者的心情会非常好，当然好心情也与他投入工作状态的程度相关。只有工作有一定的进展，在(与资讯人的)田野关系上打开一定的局面，“忙起来”时，只有找到工作的意义时，这种腐朽感才会淡出作者日常生活斗争的内容。《航海者》淋漓尽致地阐发了工作的意义，不觉让人精神一振，感到腐朽感的“物有所值”。腐朽感来自预防自己堕落到生物性的层面，与野蛮人无所区别的做法——在这一深层人性的写照下，强大的内心防御机制支持了腐朽感的抵抗力，使得马林诺夫斯基作出种种矛盾的文化理论的表述。我们在下文的“生物性与文明”部分中还会介绍这一点，这里仅仅将“文化迫力”的概念与防御相对应，将二者联系起来，这样“文化迫力”的概念会得到重新理解，即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术思想与他的日常生活斗争、内心世界并非是拆解开的，而是有其内在的联系。

“文化迫力”在《文化论》中提出，原话是这样表述的：

人类有机的需要形成了基本的文化迫力，强制了一切社区发生种种有组织的活动。在满足生理需要之外，我们又见到导生的迫力，它们既然是达到某项目的手段，我们不妨称它们作“文化的手段迫力”。^①

文化迫力的第一层次是为了满足需要，衍生出传统的教育或是广义的教育，和法律及经济组织一同形成手段性质的文化的三方面：基本的、或生物的、衍生的、或手段的、完整的、或精神的。文化迫力的第二层含义是与防御相关的，为原罪而设的消极性法规、风俗、道德禁令。文化迫力消极的、否定的面向与防御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警戒本能、欲望的泛滥，个体越轨的冲动。因此，原罪意识是文化迫力的幽灵，而此原罪，即恋母情结的复合体(complexes)，但是不同于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的“集体无意识”。马氏认为，复合体(complexes)与其是恋母情结的结果，不如说是其副产品，代之以情操，后者糅合了道德、伦理的力量，代之以情操，挖掘了人性“克己”的社会根源，是义务与责任的链条，构成了人类履行“利他”责任的可能性。摒弃了拟构历史的假说，马林诺夫斯基严格遵循社会功能的方法论，他非常不满流行于当时的类似弗洛伊德集体无意识的权威观点——涂尔干的集体欢腾、莫斯的马纳观念等过于简化的群学。马林诺夫斯基批判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的“谬误”。不过，马林诺夫斯基采纳了弗洛伊德否定式的文化概念：为了遗忘原罪而设置的风俗、法律、禁忌等精密的文化系统。弗洛伊德天才地给出了文化起源的假设，马林诺夫斯基则以民族志语境论证了文化“抑室”的作用。“抑室”是又一个在《两性社会学》中出现频率颇高的精神分析用语，与“防御”(defensive)相近。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个体永远有乱伦和犯上作乱的试探欲望，构成了社会的危险，社会的存在对个体反叛的压制和越轨的制裁，这正是社会与个体的对抗性矛盾。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一系列无法化解的矛盾，如兄弟、舅甥引起的个体悲剧。马林诺夫斯基的“抑室”观点与他的日记披露的自我有所游离。在日记中，他依靠自我的修身、克己、意志的锻炼，甚或自虐(颇有苦行僧的遗风)，来实现对堕落的规避。在《蛮族社会的犯罪与风俗》中，他以社会制度的强制力量限制、压抑和镇压个体的反叛本能，不过与风俗链相补充的是心理的炫耀和特殊性，使风俗链的社会结构配合心理的自愿，此不赘述。而且社会通往的道路占据了其他民族志著作，马林诺夫斯基的一重精神分裂开始发生：一方面他躲入日记，拼命地发泄他不能摆脱的腐朽感、堕落感，一方面他又在蛮族民族志中以社会的“超我”形象高高地居于个体之上。精神的裂痕使他的民族志文本不经意地吐露了真情：

①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6、27。

所以,文化即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要。这恐怕就是文化最大的创造力与人类进步的关键。文化把人类提高于禽兽之上,并不是由于给人类以其所能有的东西,而是指示给他看其所能奋斗追求的目标。高度的物质繁荣的时期,往往在精神上是堕落的。当文化的物质方面过于发达的时候,当运输和破坏的方法,以及大量生产和广告,支配着一个国家的生活的时候,整个社区便充满着穷奢极欲式的虚假和妄狂的需要的满足,到这时,整个的文明都大堪忧虑。人类历史上的现今这个时代便是一例。^①

如若不知出此言者是功能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就会把此言误认作儒家学派对文明、物欲的批判。

(三)生物性与文明

相较于文化迫力的概念,马林诺夫斯基的另外一个核心观点,直白的程度让人惊讶。文化性与生物性或动物性平行,文化不管经过了多少复杂的“矫饰”,最终目的还是满足人们基本的需求,如安全的需要、营养的需要等。尽管文化有超越动物性的一面,如人对后代的教育周期比动物长,而且由于漫长的教育周期的需要,夫妇不得不继续“同居”,不过,文化的总体走向是顺应本能的。我们看到,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的最低定义限定在生物性层面上。这是马林诺夫斯基备受诟病的地方。人们不解:为什么文化论有“披着文化”的生物论倾向?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的生物学基础如何解释?在宣扬生物基础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面前,他的文化论能否说是无辜的?这些问题似乎很少被人问及,然而,恰恰碰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另外一个精神分裂的发生点:情与礼曾经在他的内心发生过痛苦的肉搏。这个时候的马林诺夫斯基很像是被遗弃于荒岛的白人文明人,依靠对远方恋人的忠贞,来走过危险的情欲地带,坚守欧洲文明的标志之一:夫妇、恋人之间,基督教的贞操价值观。当他以忠贞对抗情欲时,他不能掩饰他在思念恋人的同时,还想着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种种人性的弱点,马林诺夫斯基皆有。然而,他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是,他在私人感情领域里,遵守着贞操,保留着激情,恪守中产阶级的自律,承受着情欲的痛苦,他在学术领域,正视生物性这一基本事实。他把严肃、严谨和科学的眼光投诸野蛮人的性生活,他发现了保留生物性这一基本事实激发的全部的热情。马林诺夫斯基以朴素、坦诚和客观的科学态度,不仅仅从土著粗鄙的性生活态度,更重要的是从诠释两性关系的仪式、舞会、祈爱巫术和青春期交往等性风俗当中,从生物性事实所包含的性的愉悦、享受中,捕捉极易被当作“淫荡”的性细节。在这一点上,马林诺夫斯基绝不是基督徒,更不是卫道士,表现了尊重人类生物性本能的难能可贵的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品质。

土著人认为,眼睛是全部性兴奋的动因,也是引起“渴望交媾”的传递物。眼睛、肾和性器官统一在

同一个传递通道(wotuna)中。眼睛让人觉醒,醒悟传过全身,占据肾脏,产生阴蒂的性兴奋。^②

眼睛起了桥梁作用,头、脸、嘴作为情欲的表达媒介都很重要,身材、特殊的身体部位,以至服装、装饰、化妆,均是两性关系中的性爱语言。在《两性社会学》中,马林诺夫斯基为原始性爱争得了意识形态的领地,以土著遵循本能的风俗、文化批判中产阶级禁欲、压抑个体冲动的教育和文明,认为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儿童只能在抑室的作用下进入潜伏期。马林诺夫斯基论证道,俄狄浦斯情结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但是在母权制的美拉尼西亚社会则不尽然。在此立论的基础上,马林诺夫斯基甚至大赞野蛮人自由的性生活,不惜将文化降到生物性规定的最低定义。他的用意,一是批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假说,重新讨论文化与本能复杂的关系;二是为他在个人道德领域饱受约束的“超我”在民族志领域释放“本我”的能量。我们看到,社会在迎合生物性的趋势中大大缓和了超我的紧张,避免了超我凌驾于社会之上。换言之,超我取代社会的危险是极权主义的形成。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自由与文明》当中,马林诺夫斯基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极权主义,这与他对于超我超越个体意志进入社会范畴,使其臣服于极权统治的担心不无关系。他希望看到社会与本能和谐相处,文化与生物性平行发展,由“文化迫力”保持这一平行关系,而由法律、风俗、道德牵制乱伦和犯上作乱的危险。而基本上,我们无法想象脱离了实用目的、实用手段的巫术、宗教与神话,

^①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00.

^② 马林诺夫斯基.野蛮人的性生活[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89.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航海者》中对神话的基本定义：神话是指导社会生活的宪章，通过巫术，与现实发生关联。这样，我们可以建立生物论学说的实证主义基础，文化迫力乃至更高一层的文化手段迫力。如果与生物性的基本需求“失衡”，则人会陷入道德、精神的混乱。换言之，如果抽离了生物性基础，空谈文化的超越性、超脱性，则又不啻是掩饰道学家的面目。

走入马林诺夫斯基“黑暗的心”，我们惊异：何以一个与生物性苦苦斗争、处于文明人行列的中产阶级精英会在人类学领域发展出生物学基础的文化论？这一精神分裂究竟是可理解的成分多，还是可同情的成分多？

四、弗洛伊德的投射

最后，笔者想，是马林诺夫斯基双重精神分裂的发生点——置身蛮族、全副“防御装置”的文明人的荒诞处境以及生物性与文明的悖论，使得马林诺夫斯基作出了矛盾之举。但凡他的民族志中隐匿的，尽在《严肃日记》中发泄出来；但凡在日记中苦苦斗争、竭力压抑的本能，又在民族志中自由地释放出来，获得了作者最大限度的欣赏。

马林诺夫斯基的双重精神分裂可以整合为文明与野蛮的焦虑，这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把他的精神症状与弗洛伊德的投射联系起来。不妨回想弗洛伊德《爱欲与文明》传递的“反文明”的信号，“离我远去”的野心勃勃的马林诺夫斯基，正是带着反叛的激情、反思的理性，投入到他者的意义中。可是方法论的革命直接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自我如何定位，主观与客观如何调适。马林诺夫斯基的解决办法是，在日记中，他是一个“纯正”的、弗洛伊德描述的中产阶级精英，克己复礼，文明的抑室结果是在梦中满足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愿望，日记，是珍贵的披露自我内心真实的资料，在田野中，他是一个自信的“反弗洛伊德”的实证主义的人类学家，原因在于他发现了不同于父权制社会的母权制社会，母权制的存在使得父权制的矛盾——俄狄浦斯情结大大缓解。在一系列特洛布里恩德岛的民族志中，马林诺夫斯基反复灌输的一个观点是：父亲仅仅是一个陪衬，土著没有生物性父亲的概念，父亲给了孩子纯馈赠的爱，而非作为权威恫吓、压抑孩子的恋母弑父的“原罪”意识。用来补充的是，舅权转移了父权的威严，于是，父亲对于儿子相较于外甥，有偏移的爱，由于和礼法格格不入，这种爱只能以个体悲剧的方式了结。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笔下，个人主义在强大的社会本我的控制下，只能如末日的狗呜咽几声，个人不是自杀，就是等死，这是马林诺夫斯基在《航海者》明亮的、愉快的蓝色海洋航行笔调之外，在《蛮族社会的犯罪与风俗》中散发的淡淡的忧郁和悲哀情愫。^①马林诺夫斯基真正的悲哀在于，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弗洛伊德的投射，在他自认为弗洛伊德不及的地方，他与弗洛伊德殊途同归。在他反叛的个体激情下面隐藏着对文明的皈依，他培育出的强大的防御系统，从肉体到精神，加剧了他的“可怕”的二分——生物与文化二分，礼与情二分，俗与欲二分等等，包括家庭与社会二分。正是将这个对象世界全盘打破，重新看过，马林诺夫斯基才拥有了“不需要土著解释的介入”的自信，而大胆且毫无阻碍地向着科学主义挥师而上，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范式，收获了不小的职业声望。人类学沿着马林诺夫斯基等前辈开拓的道路前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的焦虑病、现代主义的精神分裂有所缓解，或者在文化迫力的囹圄中意识不足，这也是我们接着批判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地方。文化模式的要害在于继续渗透弗洛伊德延伸至非西方世界的病理学说，虽然防御性反应对米德的攻击力较之马林诺夫斯基已经大大减弱，不过，适得其反的是，米德提倡的亲善寓言相较于马林诺夫斯基的“黑鬼”厌恶胜出一筹。实质上，科学主义，甚或是超出科学观察的实验室范畴，直接沿袭精神分析医学的权威，以怀柔的方式对土著文化横加“文化类型”的评判。较之马林诺夫斯基的矛盾境地，这似乎使人类学的处境雪上加霜。从埃文斯-普理查德的“翻译”开始，到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一直到拉比诺的“自反性”，认识论的每一步的解冻，都伴随着文明的自我枷锁的打破，这让我们不禁想起马林诺夫斯基为现代人类学科学事业的举步维艰发出的孤绝的感慨：科学的推进，永远不是顺着一条直线的简单进步，科学跨越一个新领域的时候，时常是以桎梏地，划到永

^① 马林诺夫斯基：《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影印本）。

难有收成的瘠壤。孤绝的境地与马林诺夫斯基孤独的影子形影相吊 这也是我们孤独地拥抱马林诺夫斯基、热爱马林诺夫斯基的缘起。

[收稿日期]2011-09-12

[作者简介]马丹丹(1979~)女,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上海 200444

The Dialectics of Malinowski

Ma Dandan

Abstract: One of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anthropology as an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is whether it belongs to science or humanistics. The split personality had tormented Malinowski expressed in his ethnography and field diary has affected Levi-Strauss and Clifford Geertz, at the same time, his contradictory attitudes toward sex freedom of the Melanesians has also influenced the idea of Margaret Mead such as fables of rapport. However, it is the incompatible contexts created by this anthropological master that exposed his inward nature of middle class in regard to the conception of civility and habit of self-control.

Key words: science, humanistics, culture pressure, middle class

Bazaar, Invisible Time and Uyghur's Cultural Psychology

Wang Min

Abstract: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ree types of invisible time-set on Uyghur's Bazaar by summing up the time-set on Bazaar, and then analyzes the histor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time-se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nvisible time-set on Bazaar is not onl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daily life of Uyghur, but also has its own system of customs, controls, and multiplicity, which could be studied to reveal the Uyghur's concept of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In a word, Uyghur's Bazaar has become a symbol of Uighur identity by means of cultural patterns it shows behind the invisible time-set.

Key words: Bazaar; time-set; the Uyghur(See P.134)

A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Taboos about Menstrual Cycle in Modern Folklore Studies in China

Li Jinlian Zhu Heshua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iang Shaoyuan, who has been influenced by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rends in Europe and the U.S.A,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religious customs and menstruation folklore. Jus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ampaign of modern Chinese folklore, many religious scholars, historians, writers and medical scientists had joined the discussions about social taboos on women's menstruation. They found that although menstruation is a usual phenomenon, there are many superstitious ideas about its' nature, function and meanings because of people's poor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modern China; folklore researchers; menstruation taboos; research paradigm; social impact(See P.142)

Contemporary Value of Folk Culture

Cai Zhirong

Abstract: As a traditional cultural phenomenon, folk culture's contemporary value is becoming prominent and is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Folk culture manifeste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in cultural, economic, social and other fields. At the cultural level, folk culture is the source and foundation of ethnic culture, modern culture as well as advanced culture. It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economic field, folk culture has acted as a subsystem of larger cultures, it has also become a kind of intangible capital that is producing economic benefits. In the areas of social life, folk culture's function of maintenance, unity and enlightenment can not be replaced.

Key words: folk cultur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enlightenment(See P.208)